

第八届文选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赵昌智 顾农 主编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lected Works



广陵书社

第八届文选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赵昌智

顾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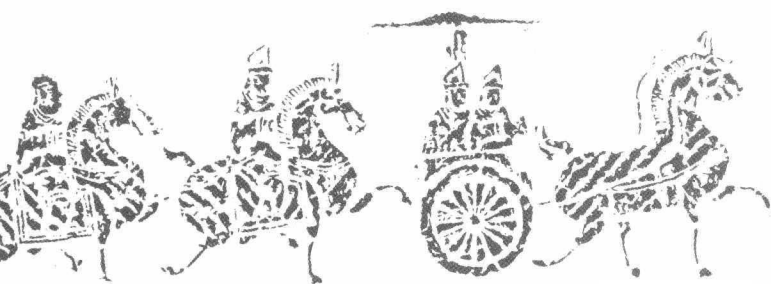
主编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lected Works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赵昌智, 顾农主编. — 扬州: 广陵书社, 2010.12
ISBN 978-7-80694-650-3

I. ①第… II. ①赵… ②顾… III. ①文选—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7218号

书 名 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者 赵昌智 顾 农
责任编辑 王志娟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539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650-3
定 价 80.00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当我还是孩童时期,读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对天际尽头的扬州不禁浮想联翩,甚而会见诸梦寐。多少年过去,等到我的学术涉猎进入《文选》学领域,并多次踏访扬州,从感性与理性上都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扬州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愈加鲜活,也愈加厚重。肇兴于隋唐之际,绵延至于今日的“选学”,便发端于扬州,风靡于一时。扬州对于每一位“选学”研究者来说,不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是学术发展史上的“圣城”。

自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展转各地,已召开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但机缘难觅,偏偏未能光顾扬州。争取在扬州举办学术会议,让“选学”重返故乡,几年间成为众多学者的共同心愿。天助人助,扬州市委宣传部得知信息,及时发出邀请,欢迎“选学”会议到扬州召开。市委宣传部原部长赵昌智先生温文尔雅,堪称学人同道,深知我辈不善筹办会议,特意于2007年莅临桂林第七届文选学术会议,面商下届扬州会议的各项事宜,大到会议时间、日程安排、下榻地点,小到餐饮、出行细节,诸事用心,令人如沐春风,感动不已。

于是在2009年8月28日至30日,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在扬州举办。在古城扬州盛名感召之下,加上东道主的热情邀约,出席会议的学者竟达96人之多,真可谓群贤毕至,老幼咸集,济济多士,满堂生辉。因为会议安排一切妥帖,与会者心无旁骛,专意问学。无论是分组讨论,还是大会发言,大多说理透辟,言简意赅,体现出很高的研究素养。会上会下,彼此切磋疑难,沟通情谊,一派以文会友的谐和景象,于今忆及,犹不免心生暖意。会议期间还有两件事,让人久久难以释怀,一是参观清代学术大家阮元的家庙,一是出席复建隋文选楼的奠基仪式。隋文选楼的复建,事莫大焉,它不仅是一项关乎市容的土木工程,而且是一项深入民心的文化工程,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情怀与人文理念,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与魄力,谓之远见卓识当不为过。

扬州会议圆满落幕,时隔一年之后的今天,再来谈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也许会更加清醒一些。扬州是“选学”的发祥地,而与会者大多研治“选学”有年,饮水而思源,对于扬州无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次能够亲临扬州,一则感受其历史氛围,一则领略其现代气息,在其故地而论其古学,于心灵之抚慰与荡涤,三言两语焉能尽言。记得我在开幕致辞时曾说过两句话,试图表达出到扬州参加会议的激动心情。当时说,借用政治家的口吻,我们的扬州之行是“寻根”之旅,“选学”之根在扬州;借用宗教人士的口吻,我们的扬州之行是“朝圣”之旅,扬州是我们“选学”研究者心中的圣城。今天看来,寻根也好,朝圣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精神境界,汲取力量,以便坚定沉着地踏上新的学术征程。从会后人们的口碑看,扬州会议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此次会议上,共提交论文83篇。研究题目范围很广,从《文选》文本到诸家注释,从文体考辨到“选学”发展史,无不有所涉及。而且不论讨论的问题大小,多能围绕“选学”这一主题谋篇立意,最大范围亦未超出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范畴。这说明我们的“选学”研究的确“术业有专攻”,也说明我们的研究在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的大前提下,具有开掘的潜质和特色。早在1995年,我曾集合“选学”研究者的共识,粗略的将“选学”的研究范畴归结为“八学”,即“文选注释学”、“文选校勘学”、“文选评论学”、“文选索引学”、“文选版本学”、“文选文献学”、“文选编纂学”、“文选文艺学”。近些年来,我们的研究在这八个方面皆有了长足进步,不过比较而言,在文献的纂集、版本的整理、发展史的探究、选学理论的阐释等基础建设方面,似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努力。

承会议东道主的盛情,扬州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已拟结集而交由广陵书社正式出版。在集稿过程中,编委会与各位作者曾有过联系,有的论文已经作者亲手修改,有的则经过编辑略作润色。编入稿件的原则大抵有三条:(1)已经正式发表过的稿件,本书不再编入;(2)拒绝出版社作编辑加工的稿件,本书无法编入;(3)不愿入编本书的稿件,本书不勉强编入。此外,由于出书规模的限制,有的文章或题材不合,或须再作补充修正,本书也一时未能编入。以上原则,如有不妥之处,统希见谅。

本书编委会执意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殷意难却,不得不率尔操觚,勉成此序。惟以时限紧迫,未遑深思,所说容有隙漏,先此告罪。最后,藉此出书良机,我愿代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与出席扬州会议的全体学人,向扬州市委宣传部袁秋年部长、董玉海副市长及扬州市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昌智先生,再次表达由衷的谢忱。

许逸民

2010年8月10日

目 录

序.....	许逸民(1)
《选序》反映的乃萧统完成《文选》后之愉悦说	
——兼与林伯谦、冈村繁两先生商榷	力 之(1)
陶诗“南山”的文化意蕴	卫绍生(7)
李善注的情感观照	
——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王允雷(12)
受命于诸子,拓宇于汉赋	
——论源锥指	王京州(17)
论《文选》中的女性作品与女性题材	王 玫 曾彩华(21)
中古小说家眼中的《洛神赋》	王晓东(27)
《九辩》为宋玉代屈原立言而作说	韦若任(32)
六朝文人音乐家的审美追求与艺术贡献	田彩仙(37)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	
——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乔秀岩 宋 红(40)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刘九伟(45)
也论《文选》李善注的体例	刘群栋(50)
“连珠”起源、命名及著录探析	孙津华(54)
从《昭明文选》编撰谈萧统的“崇悲意识”	孙浩宇(58)
白塔寺与李善注《文选》	朱福娃(62)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吴晓峰(65)
和诗说略	
——读萧统《文选》随札	宋恪震(69)
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之《文选》选诗评点	张哲愿(74)
《文选集注》价值释证	
——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张蓓蓓(79)

赋序与六朝人的文体意识

- 兼及《文选》“误析”与增序现象 张 蕾 常娟娟(87)

论《文选》的选诗观

- 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李正春(92)

- 颜延之的作品及其语言艺术 李 佳(97)

- 释《国殇》“埋两轮兮繫四马” 李若晖(102)

《文心雕龙》影响《文选》的一个侧面

- 以“文学观点”与“文体选目”的比较为例 李 莹 李金坤(104)

- 《文选》卢湛、刘琨四言赠答诗注误 杨 明(109)

《文选》五臣本是否“轻改前贤文旨”

- 驳《非五臣》之一 陈延嘉(111)

- 《文选》与文化史 陈复兴(116)

- 《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 陈 种(121)

- 《文选》赋的自然观研究 周 燕(127)

- 《昭明文选》中的“气象文学” 林中明(132)

- 《文选》墓志文类探析 林登顺(137)

- 班昭《东征赋》入《选》发微 罗志仲(144)

- 利用古写钞本校《文选序》及其相关的两个问题 范志新(148)

- 《文选》录赋与史书录赋异同论 胡大雷(154)

《文选》不录张融之作的历史考察

- 兼论萧衍的忌刻个性及其在萧子良集团中的实际地位 胡 旭 张一妮(159)

萧统“踵事增华说”再认识

- 与葛洪文学进化观比较 赵 阳(165)

- 阮元建隋文选楼之动因考述 赵昌智(170)

《文选》编辑宗旨拟测

- 《文选》研究之一 钟其鹏(177)

- 读《文选》令教文札记 奚彤云(182)

从辞令到文章

- 泛论《文选》中的行政文书 徐兴无(188)

- 再论傅山的文选评点 徐华中(200)

- 论宋玉《招魂》的谏讽风格特点 袁心澜(208)

诠释学视域下的唐代《文选》三家注

- 兼论唐代《文选》的诠释历程 郭宝军(213)

- 南朝齐梁萧氏故里研究 钱永波 昌万海 纪 东(218)

- 说《文选》所录阮籍《咏怀诗》 顾 农(223)

- 《文选》“赞”类源流考论 高明峰(229)

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	常思春(234)
论《文选》咏史诗类	
——颜延之《秋胡行》	黄水云(239)
论吴淇及其《六朝选诗定论》	黄进德 汪俊(245)
《文选》的诗学建构	黄坤尧(249)
日本宫内厅藏古写本《文选》卷二研究	傅刚(256)
汉代“以诗论赋”批评现象形成的历史考察	彭安湘(266)
文选旧注新论	游志诚(271)
读《文选》中的《挽歌诗》	童李君(276)
宋初三朝《文选》刊刻之消长的背景研究	葛云波(280)
继步陈王	
——谈文选二谢赠答诗	廖一瑾(284)
竹林七贤与《文选》研究二题	嵇宝斌(288)
诸葛亮《出师表》考释	蔡文锦(293)
嵇康《琴赋》(并序)中的文化信息	樊荣(297)
司马相如人格论	
——从“劫财”、“劫色”说谈起	踪凡(302)

《选序》反映的乃萧统完成 《文选》后之愉悦说¹

——兼与林伯谦、冈村繁两先生商榷

◎力 之

《文选序》云：“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这反映出的显然是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轻松心情²。然林伯谦先生认为此所说者非萧统当下之心境，而是其追忆往日为何要编撰《文选》之缘由³；冈村繁先生则认为“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似乎“暗示出《文选》的编纂起始于太子养病之际”⁴。今鉴于这一问题对《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重要，故不得不为专文以辨之。不当处，祈林、冈村两先生及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云。

林先生在其《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一文中引穆克宏先生之“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监抚馀闲’六句。这六句是写萧统在编选《文选》时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多么悠闲自在。其母去世以后，他可能有这样的心情吗”⁵说后，驳云：

这些论证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也就是萧统并非真正主编者，当他写序说出“监抚馀闲，居多暇日”，不过回溯往昔所以要编出《文选》的缘由，并不涉及当下心绪如何；而且《文选》疏误不少，如果当时那么多人才，在充裕的时间却编出一部有瑕类的书，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里说的明明是“余”（萧统），怎么“换个角度思考”，“余”就能变成“非余”？如果萧统非《文选》的真正编者（注意：不仅仅是“真正主编”），他又怎么会强调“余监抚馀闲……移晷忘倦”？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换角度”的任何空间。我们知道，林先生赞同《文选》“实际编纂者为刘孝绰”说。其云：

¹ 本人提交“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为《〈文选〉成书时间考说》（26000字），今限于篇幅，取其中之一节扩而成此。

² 参力之《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又，穆克宏《〈萧统研究三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第149—15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两先生亦如是观，且说得更为明晰。

³ 林伯谦《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东吴中文学报》第13期。又，本文引林说，均此。

⁴ 冈村繁《文选之研究》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又，后引冈村说均出是书，而仅随文注明页码。

⁵ 原注：“穆克宏《萧统研究三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第14页。穆氏之见，在其多篇著作皆再三致意，如《〈昭明文选〉研究》、《文选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等亦然。”按：此说非也。穆先生之“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云云，并不见于其此前之《〈昭明文选〉研究》、《文选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等。

清水氏藉此¹证明萧统编书仅是挂名,实际编纂者为刘孝绰。笔者对此亦表赞同……刘孝孙的序文说得很清楚,刘孝绰撰《诗苑》,慧净的《诗英华》则纂续之……既然《诗苑》就是《诗苑英华》,则刘孝绰就很可能是萧统身边重要的纂编人了……刘孝孙这篇序文能在当时广为流传,道宣甚至全文照录,显然他的说法是得到认同的;也就是说直到初唐时期,刘孝绰主编《诗苑》是被认可的。

其实,我们早就说过:“《颜氏家训·文章篇》说刘孝绰‘撰’之《诗苑》,确是昭明太子《古今诗苑英华》。”²然林先生于此,思却恐有所未密。昭明太子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得极为清楚,其“往年因暇,搜采《英华》”³。不难设想,从编纂实质性意义上说,《诗苑》若非昭明太子所编,而是“刘孝绰主编”,其会强调自己“因暇”吗?答案自然是否定。即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太子之说远比颜氏之说可信⁴。下面再举几例,以便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其一,据《南史》卷50《庾肩吾传》载,“高斋十学士”(“高斋学士”)乃属萧纲。然至晚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奉敕所撰《图经》(史称《祥符图经》)时已将其误归昭明太子。其后,承其误者不胜枚举。甚至有如杨慎者,竟云:“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固、孔焯、鲍至十人,谓之‘高斋十学士’,集《文选》。……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⁵不仅如此,即使在高步瀛先生于《〈文选序〉义疏》中辨“‘高斋学士’乃简文遗迹,而无关昭明选文也”⁶后,仍有不少学者因不知高说而继续将“高斋十学士”归之昭明太子名下⁷。

其二,四库馆臣云:“《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⁸即就今存文献看,是说亦未及别《楚辞》为一门之“源”⁹。另外,章学诚云:“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¹⁰其后,王瑶先生亦用章氏之说,其云:“《楚辞》自阮孝绪《七录》,即收入集部。但范围性质既和后来的文集有别,所以《隋志》特立楚辞类,并总集、别集为三类,以后就成了定法。”¹¹问题是,“《隋志》特”云云,乃章氏疏忽于前,而王先生以此疏忽为是于后所致。据阮孝绪《七录序》,可知:《七录》内篇四为《文集录》,而《文集录》分为

1 “此”者,即其前文“《颜氏家训·文章》云刘孝绰‘又撰《诗苑》’”。

2 赵福海等主编:《〈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14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3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第1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 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关于〈古今诗苑英华〉的编者问题》(《〈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144—149页)、《与林伯谦先生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

5 《升庵集》卷52《集〈文选〉文士姓名》,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文选李注义疏》第一册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

7 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按:稍后,同于高氏说者尚有周贞亮(《文选学》第30页,国立武汉大学1931年版)、骆鸿凯(《文选学》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先生。即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读者有更多的机会知类杨慎说之非。

8 永瑔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类馆臣说者尚多,如李详先生之“……《隋志》因标《楚辞》一目,不列总集之内,后世相承不改”(《李审言文集》上册第16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黄侃先生之“《隋书·经籍志》别《楚辞》于总集,意盖亦同舍人”(《文心雕龙札记》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骆鸿凯先生之“《隋·经籍志》集部特立《楚辞》一类,后世仍之”(《文选学》第26页)、莫砺锋先生之“后来《隋书·经籍志》集部还特设‘楚辞’一类……”(《从〈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董治安先生之“《隋书·经籍志》以下各种目录文献更在《集部》特立‘楚辞’一门……”(《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等。

10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卷3《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¹即以《楚辞》独立为类,《七录》已“特”。若《七录序》失而据章氏“一家之书”说,或以为《七录》入《楚辞》于“别集部”。

其三,俞正燮云:“东方朔《答客难》视《汉书》多‘《传》:曰天下无害灾’……二十七字,盖昭明得他本增入者。”²“二十七字”云云,不确;“‘积数十年’‘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等二十字,亦《汉书·东方朔传》之《答客难》所无”,而骆鸿凯先生引此,不仅“未觉其此数失,且《癸巳存稿》与‘二十七字’又俱被误作《癸巳丛稿》与‘一十七字’”³。不仅如此,40余年后,台湾学者李璠先生撰《昭明文选》一文引此复以骆先生之失为是。⁴

综观以上例子,不难发见:名家也难免时或张冠李戴、人云亦云。而这种情况不仅古今皆然,且由于学术后来转精等等,故相对而言,其在古人那里更为常见些。记住这一“常识”十分重要,否则,我们自以为得者,恐似是而非。如关于“高斋学士”归属的《祥符图经》说与杨慎说便是典型的例子。基于此,林先生之“刘孝绰主编《诗苑》是被认可的”云云,便说明不了什么。何况“道宣甚至全文照录”一事,还无法证明“刘孝孙这篇序文能在当时广为流传”。概言之,如上所述,由于昭明太子有“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之说,故即使“到初唐时期,刘孝绰主编《诗苑》是被认可的”,仍无法给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的“自刘廷尉所撰《诗苑》之后,纂而续焉”说“加分”。道理很简单,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刘孝孙说是无法与昭明太子本人说比的。比观我们前面所举之例子,思过半矣。因之,这里成为问题的只是刘孝孙何以如是说?而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其与《古今诗人秀句序》之“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⁵说等类似,均当因史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⁶之说,而将此与撰《太子集》误混为一事所致⁷。

至于“疏误不少”云云,如果学养甚好的林先生撰此大文时注意以古还古,并跳出《文选》来考察其这些“疏误”是不是问题,恐就不会有“这不是很奇怪吗”之问了⁸。

回到上面的问题上来,退一步说,即使这是“回溯往昔所以要编出《文选》”的缘故,并不涉及当下心绪如何,亦然。何况,“不涉及当下”云云,绝非圆照。试想,如果想要编撰《文选》之初心情如此畅快,而“编务正式展开”后心境大坏,其会如此写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以之与《九章·惜往日》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比观,一清二楚。“惜往日之曾信兮……虽过失犹弗治”,乃“回溯往昔”之愉悦;而“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以下,却回到极为痛苦的“当下”。其实,《惜往日》这里所写的,正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其后,潘安仁《怀旧赋》之“余总角而获见,承戴侯之清尘。名余以国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亲。欢携手以偕老,庶报德之有邻。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陈蓼被于堂除,旧圃化而为薪。步庭庑以徘徊,涕洟流而沾巾。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

1 道宣《弘明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与《弘明集》合刊)。

2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2《〈文选〉自校本跋》,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3 力之《俞正燮〈文选自校本跋〉辨证》,《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

4 骆鸿凯《文选学》第35页;张其成监修《中华百科全书》第五册,第12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版。

5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6 《梁书》卷33《刘孝绰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7 可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8 参力之《〈文选〉之种种问题均与其成书是否仓促无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与《关于〈艺文类聚〉引书文之无序问题》(《宋永培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谁语,聊缀思于斯文”¹,李煜《虞美人》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在《神曲·地狱篇》中写弗兰齐斯嘉对他说之“再没有比不幸中回忆幸福的时光更大的痛苦了;这一点你的老师(之按: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前70—前19])是知道的”²等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显而易见,萧统这里所说的,虽有追忆的成分,然其更多的无疑是当下,并以此为落脚点。否则,若当下窘迫无绪,其还会有如此愉快的心情说“往昔”之美好而不涉及“当下”之“痛”?反之,既然一直“居多暇日”,《文选》便不可能是仓促成书。这一点,笔者在此前发表的《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一文中,已说得非常清楚。客观地说,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文选》确实多“硬伤”。问题是,持《文选》仓促成书者,(1)仅就《文选》来说《文选》,而非跳出《文选》以观《文选》;(2)忘却今古之异,而以今律古。殊不知,这两点乃研究《文选》成书状况之大忌(当然,不止于此)。不仅如此,林先生在该文的同一节中又云:

萧统既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显露对编成的《诗苑英华》不甚满意,“犹有遗恨”,这使他意图编出如《文选》这样包含赋、诗、文的总集,虽然编辑大原则有所商讨(如时代断限等问题),却迟迟未能进行,人事的异动纷扰当是原因之一,直至陆倕、丁贵嫔相继辞世,萧统母丧,于是由返任太子仆的刘孝绰总其事,编务正式展开,不料在编辑最后阶段,又逢刘孝绰丧母,所以《文选》是刘孝绰丁忧之际匆促编成的。

请问,“回溯”轻松心情之“往昔”是何时呢?其实在这里,答案只有两个:即所谓“编辑大原则有所商讨”之时与“编务正式展开”之日。然就前者言,“迟迟未能进行,人事的异动纷扰”;就后者言,“萧统母丧……刘孝绰丧母……匆促编成”。这就是昭明所说之“居多暇日”?这流露的就是轻松自在的心情?——从“回溯往昔”云云看,林先生是承认“余监抚馀闲……移晷忘倦”表现的是作者轻松愉快之心情。可见,“回溯往昔”云云,是断不能成立的。此其一。其二,在该文中,林先生又与笔者一样认为《文选序》作于《文选》成书之后,作者为萧统。因之,以《文选序》的这六句话比观林先生此段文字,其逻辑结果只能是这么两点:(1)《文选》乃撰《文选序》者所编纂而与他人无实质性关系,故“人事”即使如林先生所说之“异动纷扰”,便自“异动纷扰”而与此无涉;(2)《文选序》必成于“萧统母丧”之前,否则,“余监抚馀闲”云云所抒写之轻松心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三,“虽然”“却迟迟”“直至”“于是”“不料”“所以”云云,均缺乏应有的文献支撑。至于“匆促编成”云云之不能成立,前面已说,故兹不赘。

二

至于冈村先生,其在《〈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一文(即《文选之研究》第一章)中引《文选序》之“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太半难矣”一段文字后,云:

根据这段序文,萧统当时是出于政事军务之外馀暇颇多,为悠然充实地享受时光,而倾心沉浸于诗文中的。由于周汉以来历代诗宗文豪所留下的作品汗牛充栋、良莠杂存,既妨碍他有效地阅读玩赏,也无法满足他学习借鉴的切望,因此萧统才产生了编选动机。^(页59—60)

¹ 萧统《文选》卷16,中华书局1977年版。

² 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地狱篇》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文选》所录作品来源如何？这里暂且不论。然“政事军务之外餘暇頗多”之于“监抚餘闲，居多暇日”，可谓的释。不过，冈村先生在后文却云：

本应忙碌于治理万民公务的皇储在《文选》序文中述及编纂缘由时却如此写道：“余监抚餘闲，居多暇日”，这令人颇感异常。这种异常似乎也暗示出《文选》的编纂起始于太子养病之际。^(页89)

“暗示”云云，实在令人难以思议——以冈村先生良好的学术素养而有如此断章取义之解读（详下）！不仅如此，其“据《梁书》的《昭明太子传》以及《南史》中的梁武帝诸太子传的相关记载看，上述的五年（之按：指普通七年至中大通三年）编纂期间，正值萧统食欲低沉、身体陷于严重衰弱，且因直面死期而心志憔悴、呻吟喘息之时期”^(页11)，太子至丁贵嫔“殡”时已经患上“不治之症”^(页80)说，亦甚是牵强而非《梁书》《南史》所载之事实。“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紧接于“余监抚餘闲，居多暇日”，这是“身体陷于严重衰弱”而已经患上“不治之症”者之精神状况与作为吗？况且，据《南史》记载，中大通三年三月，太子还“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¹。此其一。其二，冈村先生又云：“从当时编选诗文集一般不收尚在世作家的惯例推论，该年（之按：指陆倕去世之年）当是《文选》成书时间的上限”^(页11)，而《文选》编纂的目的“是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的赏读需要”^(页91)。不错，《文选》确实不收在世作家²。问题是，其编纂目的如此，还会在意作家之在世与否吗？于此，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赏读”与站在选家的立场上为编纂“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选本而选文，两者多有差异。况且，冈村先生又说：刘孝绰接受太子嘱托后，其编纂《文选》的具体构想便“充分兼顾当时文坛的流行新潮”^(页89)。其三，《文选》果真“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的赏读需要”而编，还有分那么细的必要，以至如诗类既立“招隐”，又立“反招隐”，而后者仅收一首作品吗？其四，《文选》的编纂目的果真如冈村先生所说的那样，太子自己有必要撰序吗？退一步说，太子欲撰序，有必要说明其选文范围与选“赞论”的标准，以及交代“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吗？其五，据史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³不难想象，《文选》中的部分作品，尤其是诗歌，必已为太子所“忆”。故例以冈村先生之“为满足……赏读需要”说，其便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不仅如此，冈村先生的这一说法又与其前面所说自相矛盾。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余监抚餘闲，居多暇日”说都无法与“暗示出《文选》的编纂起始于太子养病之际”沾得上边，除非冈村先生全不顾史实及情理（逻辑）。显而易见，是说乃无任何文献支撑的无根之说。

另一方面，冈村先生在我们前面所引的“颇感异常”下注云：

“多暇日”语，最早见于《荀子·修身》：“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入）不远矣。”此后皆以此指怠惰。晋张华《励志》诗：“虽有淑姿。放心纵逸。田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虽劳朴斫，终负素质。”其意亦同之。^(页95注29)

“多暇日”，其意确实不少是“怠惰”。如《说苑》卷3《建本》之“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为者，偷慢懈惰，多暇日之故也”、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5《神宗·熙宁九年》

1 《南史》卷53《梁武帝诸子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参力之《宴常之〈文选〉“所录皆前人作”说可信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 《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

的“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之“多暇日”。然萧统《文选序》之“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与其《答晋安王书》之“既责成有寄，居多暇日，殽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间无人，致足乐也”¹，以及此前谢灵运《山居赋》之“伊昔韶皃，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²等文中之“多暇日”，则不然。另外，梁释慧皎《高僧传序》“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³之“尝以暇日”，亦绝非“指怠惰”。此乃常识，稍加比观冈村先生在同一文中的前后之说，便知其是十分清楚《文选序》之“居多暇日”与“怠惰”间，尤“风马牛不相及”。汉学根柢深厚的冈村先生所以类等周人之“璞”于郑人之“璞”，无非是要证明：

与《文选》的编纂进展相伴随的是昭明太子的病情发展，因此编纂必须加速进行。幸运的是刘孝绰所面临的条件极为有利，他手头已有各种现成的前人所编的优秀选集。……三十卷的《文选》……是以刘孝绰为中心，大量采录以往各种选集中作品、对之再度编纂的结果。……它不过是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的赏读需要，全面利用以往选集，并在短时期内匆匆抽选编成。
(页90—91)

然而，未腊之“鼠”终归是未腊之“鼠”，而绝非未理之“玉”。实话实说，“本应忙碌于”“令人颇感异常”“《文选》的编纂起始于太子养病之际”云云，笔者怎么找也找不到此非想当然之任何理由。因为“皇储”撰于此前的《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分别已有“居多暇日，殽核坟史”与“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之说。而“以刘孝绰为中心”与“再度编纂”云云，其前者以清水凯夫说为支撑，然清水先生之“《文选》的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说是断不能成立的⁴；后者则未达一间，然其与本文关系不大，故兹不详。至于既无任何文献支撑，又殊乖于情理之“因此编纂必须加速进行”云云，则除冈村先生外，头脑清醒之学者恐无一敢如是说（因为谁都清楚：《文选》非治“不治之症”之灵丹妙药！）。概言之，冈村先生此说本不圆，其却以牵强之法圆之。从方法论层面上看，其失之关键乃因未能就整体来考察局部。

结 语

综上所述，昭明太子序《文选》之“监抚馀闲，居多暇日”说，既非林先生的“不过回溯往昔所以要编出《文选》的缘故，并不涉及当下心绪如何”，亦非冈村先生猜测的“暗示出《文选》的编纂起始于太子养病之际”。《文选序》反映出的确实是萧统本人轻松愉悦之情，而这正是其在《文选》完成后内心感受的自然流露。据此，由于《文选》“所录皆前人作”，而其所录作家之最晚者陆倕卒于普通七年，且同年十一月丁贵嫔辞世，故可证《文选序》完稿的下限当为普通七年十月，上限则当为陆倕卒后⁵。易言之，本研究还可间接地证明陆倕卒于丁贵嫔前。

于此，尽管我们不同意冈村先生与林先生之说，然对他们为在更高的层面上求是之热诚与执着，深表敬意。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 俞绍初上揭书，第74页。

2 《宋书》卷67，中华书局1974年版。

3 释慧皎《高僧传》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281册。

4 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5 参力之《〈文选〉成书时间考说》，《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年第2期。

陶诗“南山”的文化意蕴

◎卫绍生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使用“南山”一词,然而“南山”究竟何指,自《文选》李善注以来的各种注本,很少予以解说。当代学者对“南山”的解释则是见仁见智,或说指陶渊明居住地之南的山,或说指庐山,或说指终南山。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试图把“南山”坐实。笔者以为,陶诗中的“南山”既实有所指,又是对传统文化中“南山”意象的借用,是本体与喻体的结合,有其言外之意和象外之境,既代表隐居之地,又隐喻陶渊明所向往的以耕为隐的生活方式。

作为隐居之地的“南山”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南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地名。《诗经》有多篇吟咏“南山”的诗章,例如《齐风·南山》之章,开篇“南山崔崔,雄狐绥绥”二句,既是描绘南山景象,又是以之起兴,讽刺齐鲁二国之君。春秋时期,齐襄公之妹文姜嫁与鲁桓公为妻。公元前694年春,鲁桓公与齐襄公相会于泺水,之后携妻至齐国。文姜通于齐侯,鲁桓公知之,贬谪文姜。四月丙子,鲁桓公未及归国,就死在自己的车中。《南山》之章就是以此事为背景,讽刺齐鲁二国之君。《南山》之章所说的“南山”,位于齐国都城(今山东临淄东北)之南,是因其所处方位而称之。朱熹解释说:“南山,齐南山也。”¹

不过,通常所说的南山,则是指今秦岭,以其在西周都城丰镐和西汉都城长安之南而称之。《尚书·禹贡》有“终南”之名,《小雅·信南山》有“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之句。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南山与终南山已同时存在,而其指称实则为一。正如《文选》李善注所说:“《尚书》曰:‘终南、惇物,至于鸟窠。’《汉书》曰:‘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五经要义》曰:‘太一,一名终南山,在扶风武功县。’此云终南太一,不得为一山明矣。盖终南,南山之总名;太一,一山之别号耳。”²

比较而言,《乌鹊歌》中的“南山”,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了。战国时期,宋国末代之君康王欲纳舍人韩凭妻何氏为妇,先把韩凭抓了起来,然后逼何氏就范。何氏宁死不屈,自缢之前,歌《乌鹊歌》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其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³古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南,其版图以今河南商丘为中心,包括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的一部,境内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哪来的山?可是,何氏的歌中却使用了“南山”一词。很显然,诗歌中的“南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它代表的是一种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地方。

从到一个确指的地名,再到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南山”不仅完成了它的语义演变,而且还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秦汉之后,“南山”则进一步演化为隐居之地的象征。

¹ 朱熹《诗经集传》卷三,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本《五经四书》(中)1985年版,第40页。

² 李善《文选注》卷二,张衡《西京赋》“于前则终南太一”句下注。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1977年版,第37页。

³ 陈耀文《天中记》卷十八引《九国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南山”作为隐居之地,始于殷周之际的吕尚。旧题刘向《列仙传》载:“吕尚者,冀州人,生而内智,豫知存亡。避纣之乱,隐于辽东四十年。西适周,匿于南山,钓于磻溪,三年不获鱼。比间皆曰:‘可已矣。’尚曰:‘非尔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钐于鱼腹中。文王梦得圣人,闻尚,遂载而归。至武王伐纣,常作阴谋百餘篇。服泽芝、地髓,二百年而告亡,有难而不葬。后,子伋葬之,无尸,唯有《玉钐》六篇在棺中。”¹ 磻溪是渭水上游的一条小溪。今宝鸡市东南的磻溪河畔有钓鱼台,它南依秦岭,北望渭水,相传是吕尚隐居南山时的垂钓之地。据此可知,“南山”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是高士的隐居之地了。

“南山”作为隐居之地的代名词,完成于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即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河内轵(治今河南济源市南)人,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秦始皇时,四人见秦政暴虐,乃共入商洛,隐居于地肺山,以待天下安定。及秦败,刘邦闻四人高名而征之,四人皆不应征召,深自匿于终南山中。² 商山四皓的家乡,南临黄河,北依太行山,四人如欲入山隐居,太行山是很好的隐居之地。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四人舍近求远,偏偏要跑到远在关中的地肺山去隐居。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合理的解释就是早在商山四皓之前,终南山(即南山)就已经是为世人所认可的隐居之地了。商山四皓隐居于此,既是为了强调其隐居的正当性,同时无意中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已有的共识。

正是因此,后人遂把四皓隐居之终南山视为隐居之地的代名词。两汉以后,“南山”作为隐居之地代名词已广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记述隐士生活的时候,常常把其隐居之地称为南山。西汉末年隐士韩顺的隐居之地称为南山,即其一例:

韩顺字子良,天水成纪人也。以经行清白,辟州宰,不诣。王莽末,隐于南山。地皇四年,汉起兵于南阳,顺同县隗嚣等起兵,自称上将军,西州大震。唯顺修道山居,执操不回。嚣以道术深远,使人赏璧帛,卑辞厚礼聘顺,欲以为师。顺因使谢嚣曰:“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即欲相师,但入深山来。”嚣闻矍然,不致强屈。其后,嚣等诸姓皆灭,唯顺山栖安然,以贫洁自终焉。³

这里直言韩顺“隐于南山”,但此处所说的“南山”,是韩顺家乡天水成纪的南山,还是秦岭的终南山,抑还是其他地方的南山,则是不得而知。所以,这里的“南山”实际上很可能是借用为隐居之地的代名词。

东汉安帝年间,挚恂也曾隐于南山。据《高士传》记载,挚恂字季直,京兆(今陕西长安)人,明《礼》、《易》,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词论清美。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麟等自远方而至从其学者十余人。挚恂既通古今,而性复温敏,不耻下问,故学者宗之。慕先人挚伯陵隐居不仕之高义,隐于南山。⁴ 《后汉书·马融传》亦载其事:“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⁵ 挚恂的家乡在秦岭之北,南与终南山相接,所以这里所说的“南山”,可以指挚恂家乡之南的山,也可理解为终南山。但皇甫谧和范晔不明确说出挚恂隐居之山名,而仅以南山代之,实际上也有以南山为隐居之地的意思。

魏晋隐士的隐居之地,亦有称南山的。稍早于陶渊明的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故城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人,少有远操,沉静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不应州郡辟命。太守杨宣慕其高致,画其像于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爰称

1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八。

2 皇甫谧《高士传》卷中。

3 皇甫谧《高士传》卷中。

4 皇甫谧《高士传》卷下。

5 范晔《后汉书》卷九十《马融传》。

赞他“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¹ 这里的南山，虽是实有所指，但已经蕴含了“南山”作为隐居之地的文化意蕴。

吕尚、韩顺、挚恂、宋纤等人隐居之“南山”，虽然皆是实有之地，但并不是同一南山。相关记载皆以南山来指称他们的隐居之地，则是接受了传统文化赋予“南山”的象征意义，肯定了隐居南山的正当性和正统性。也许正是因此，韩顺、挚恂等隐士才选择南山而隐居。

作为躬耕之地的“南山”

孔子曾经把那些以耕为隐的隐士称为贤者：“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² 这里所说的“作者七人”，有论者以为是指长沮、桀溺、荷蓀丈人、石门荷蓀、仪封人、楚狂和接舆。这些所谓的“贤者”，皆是以耕为隐的隐士，与“南山”没有联系。但他们这种以耕为隐的生活方式，却为后世隐士效法。

到了西汉杨恽，这种以耕为隐的隐居方式开始与“南山”联系在了一起。杨恽是汉宣帝时人，司马迁的外孙，以首告霍氏谋反事有功而封平通侯。与太仆戴长乐相忤，因事牵累免官，被贬为庶人，退居家乡华阴，以农耕为业。他有《拊缶诗》（又作《南山种豆诗》），写其躬耕南山的生活与感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在这首诗中，杨恽借“南山”寓以耕为隐之意。他“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与当地强豪多有交往。安定太守孙会宗与杨恽有旧，与书谏之。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自言“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并表示“长为农夫，以没世矣”。³ 他在信中记录下自己上面这首诗，借以表明自己甘老畎亩的想法。后来此诗传至京城，有人以为意在讽刺汉宣帝，杨恽竟因此诗而遭腰斩之祸。东晋袁宏以为“杨恽非忌贵，知及有馀辞。躬耕南山下，芜秽不遑治”，⁴ 对杨恽之事有独特见解。

杨恽之后，躬耕于“南山”者代不乏人。东汉末年，冯翊池阳（治今陕西泾阳西北）人吉茂与扶风武功（今陕西眉县）人苏则，共入武功南山，隐居务学，躬耕为业。与杨恽不同的是，杨恽隐居之南山为华山，而吉茂和苏则隐居之南山则为武功山。二山虽然同属秦岭，但毕竟各有其名。有关记载不言华山或武功山，径以“南山”称之，则是在无意识中取用了传统文化赋予南山的语意——隐居之地。

东晋时期，浔阳翟氏四代皆隐居县界南山。翟汤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享有高名。西晋怀帝永嘉末年，天下大乱，地方多受侵扰，而柴桑百姓却仰仗翟汤的高名得以免受战乱之害，史家称之为“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⁵ 翟汤高名既著，屡辞朝廷征辟，做了一辈子隐士；翟庄有乃父之风，“耕而后食，语不及俗”，不应朝廷征命；其子翟矫亦有高操，屡辞征命；其孙翟法赐继承家风，结室于庐山之顶，远避尘世。父母过世后，翟法赐遂不复还家。翟家祖孙四代隐居县界南山，躬耕垄亩，不应征命。其中翟庄隐居南山的生活最有代表性：

庄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及长，不复猎。或问：“渔猎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庄曰：“猎自我，钓自物，未能顿尽，故先节其甚者。且夫贪饵吞钩，岂我哉？”时人以为知古。晚节亦不复钓，端居华门，啜菽饮水。⁶

1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

2 《论语·宪问》。

3 班固《汉书》卷六十六《杨敞传》附《杨恽传》。

4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五。

5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

6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